

日本秦汉史史学会前会长池田雄一：

从出土简牍出发挑战“都市国家论”

“当时中国古代都市国家论、城郭都市论成为得到较广认同的理论。我完成了数篇关于中国古代聚落和最末端地方行政的小文,提出了中国古代不是都市国家而是以自然村为形成基础等观点。”

从四国到中央

郑威:听说池田先生出生于爱媛县,年青时从遥远的四国远赴位于东京的中央大学学习。能否介绍一下您年轻时的经历,特别是大学和研究生时期的情况?是哪些经历促使您选择中央大学和东洋史专业呢?

池田雄一:我于1937年7月出生生于爱媛县东温市(原温泉郡)。我出生的家位于从山地向流瀨戸内海的重信川上游的一处海拔约120米的高台地上,下方十六、七公里处就是广阔的瀨戸内海,当时远眺可见交错往来的船舶。重信川在从山地向下流淌的过程中冲积形成了扇状地,扇状地的两端与山地相接,我出生的家就在二者相接的扇轴处。在扇状地背后,东方矗立着四国的最高峰石鎚山,这一带当时虽然只是清淨的农村地带,但是随着四季季节不同变化丰富,环境悠闲而舒适。

重信川下流的扇状地是县厅所在地松山市,当时从老家到东京的话,需要在旧国铁松山站先乘火车,再换乘摆渡船,单程超过24小时。那是一个从农村地区前往东京的大学求学的年轻人比较少的时代。上京后来到了1950年代后半期的东京,战后的伤痕仍然随处可见,人们的生活也充斥着窘迫的气氛。

学部毕业后的数年间,我在地方上的高中执教,担任世界史教员。考虑到想再多学一些能够安身立命的专业知识,我决定进入大学院继续深造。

当时我所关心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古代西北部的历史变动,而那时中央大学大学院在任的有我国敦煌文书研究的开拓者鈴木俊教授和吐鲁番研究专家嶋崎昌教授,这样十分便于我的研究领域的深入。我在院生时期的指导教授就是鈴木俊教授。我还列席了宋史专家青山定雄教授的讲筵,他也是历史地理研究方面的专家。

郑:1968年修满博士课程学分之后,您长年在中央大学工作,直至2008年3月退休,长达



池田雄一与《中国古代的聚落与地方行政》中译本(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编“日本学者古代中国研究丛刊”,郑威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四十年之久。在中央大学工作的岁月中,您主要从事哪些学术研究,是如何选择并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的呢?研究方向确立后,经历了哪些波动呢?

池田:大学院博士课程学分修满之后,我于1968年成为了特殊法人亚洲经济研究所专门员,主要从事《現代中国關係中国語文献総合目録》(全9冊,アジア経済研究所,1967~1971年)的编纂与发刊,同时,这一年拙稿《漢代における里と自然村について》(《关于汉代的里与自然村》)(《東方学》38,1968年)发表。我的硕士论文的题名为《前漢時代における西北経営について》(《关于前汉时期的西北经营》),在大学院学习时曾发表《漢代西北部における新秩序形成過程について》(《关于汉代西北部的新秩序形成过程》)(《中央大学文学部紀要》史学科12,1966年)等论文,刊载于《東方学》上的论文,将研究领域转移到了中国内陆地区的聚落及末端的地方行政。

我的硕士论文以汉王朝如何在新开发的中国西北部确立新的郡县秩序为题,论文结论指出,在自然流徙中居民逐渐定居化,汉王朝以此为基础不断推进当地的郡县化,而当时西嶋定生教授所主张的徙民政策实现了作为国家性事业的新秩序的形成的观点难以成立。

根据我的理解,国家对居民的强制性介入并不会那么容易地成功,沿着这一认识,我考虑从王朝控制的全部地域来探讨皇帝控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决定把视线转移至中国内陆地区的聚落与末端的地方行政。

1970年我到中央大学赴任,一直在职,直至2008年年满退職。在此期间,1970、1980年代的研究课题主要是以拙著《中国古代的聚落与地方行政》所收录的各种论文为中心进行的。

研究的对象包括新石器时期至汉代的聚落和殷周时期至汉代的地方行政等较末端的组织,从居民的自然流徙确认了聚落形成的动向和国家对地方末端组织的控制界限。这些见解与当时我国较有影响力的学说——西嶋定生教授等的皇帝对人民的一元控制论以及宫崎市定教授等的都市国家论都格格不入,也甚至因此受到了口不择言的严厉批判。

进入1980年代之后,我逐渐也对新出土简牍展开研究,兴趣转移至睡虎地秦简等法制史史料上。简牍是能够确认当时国家控制实态的贵重的同时期史料,在利用简牍资料验证既有的聚落和地方行政研究观点时,我觉得法制史领域的研究是不可欠缺的,因此将研究的部分重心转移至法制史,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是2008年刊行的拙著《中国古代的律令与社会》(汲古书院)。

郑:据了解,您在早年就加入了东方学会、史学会、历史学研究会,长期参加学会活动,另外还参加了法制史学会、东洋史研究会、唐代史研究会、日本秦汉史学会、日本出土资料学会等。加入这些学会有着怎样的因缘契机呢?对您的学术研究和发

展又产生了哪些影响?

池田:学会刊行机关杂志、掲載研究论文,与之并重的是介绍各种各样的学界动向,对

了解最新的学界动向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有的学会我早在学部时代就入会了。通过学会的大会和例会与研究者进行交流,是我当时的贵重收获。关于学会的人会,有些是需要由从属于学会的相关人员介绍的,如东方学会、法制史学会等,但多数的学会是由个人向事务局提出申请才能够成为会员的。

与我的领域不同的唐代史研究会,恩师鈴木俊教授是学会的首任会长,承担了学会创设之时的事务局工作。鈴木俊教授的讲义都是以唐代经济史为中心的,所以我也想涉猎与唐代史相关的研究,不过时间上似乎没有空闲。

还有些组织小规模读书会的学会。我也参加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会今年迎来了创会70周年。这个由三上次男教授创设的学会时至今日仍然持续举行读书会,今年秋天将刊行由25名执笔者撰写的纪念论文集《中国古代史研究第八》(研文出版)。

散布的小聚落让人深切认识到讨论城邦、都市国家论是多么地无意义

郑:您在《中国古代的聚落与地方行政》中提出中国古代的聚落以自然出现并形成的“自然村”为主,能否对您的这一研究思路进行简要的概括?日本学界盛行的“城邑国家”、“都市国家”等观点目前在中国也较为流行,您对此有何评价?

池田:关于中国古代的聚落为都市国家这一见解,在我国,宫崎市定教授主张上溯汉代的“古代中国”是与希腊、罗马时代的城邦(polis)相同的都市国家。宫崎教授认为在世界史的演进过程中各地的实际情况相同,经历了古代、中世、近世发展而来,在这一认识之下他倡导的是“古代中国”的都市国家论。相关的理解为:前田直典氏和西嶋定生教授所提倡的承认世界史发展具有普遍性的中国史时代区分论,虽然在时代划分方面认为古代结束于唐这一点上存在差异,但其方向

性是十分一致的。

就中国古代的都市国家论而言,讨论聚落的外形究竟是散村(即自然村)还是集中式的聚落,涉及的只是问题的一部分而已。至少未将聚落内的社会构成与日常的政治活动作为讨论的对象。不过,由于所涉及的是地域社会最末端的情况,在我开始从事聚落史研究的1960年代后半期,虽然存在补充传世史料的居延汉简,但要想综合验证这些相关的问题,取得确切的证据仍然是非常困难的。

即便如此,我还是利用有限的史料对都市国家论提出了异议,当然也受到了批判。出乎意料的是,《文物》1975年第2期和1976年第1期公布了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地形图与驻军图,从中可以确认里并不只是城郭之内由街巷区隔的居住地,而是独立存在的小聚落,其规模平均为41户。

马王堆古地图呈现的是如满天繁星一般点状分布的散村化的小规模聚落。这些散布的小规模聚落只能认定为自然村,同时,散布的小聚落让人深切地认识到讨论城邦(polis)、都市国家论是多么地无意义。

不过,古地图所绘制的毕竟只是边境之地,将其一般化的话会存在一些疑义,但是,除了县治所等政治性强的聚落,在当今的考古学发掘调查中是无法确认一般性的聚落中存在很多点状分布的由城郭包围起来的集中式聚落的,当然,新石器时代的环境聚落另当别论。

集中式聚落有些是由集住(synoikismos)一类的人为外力促使而形成的。但是,需要用城墙来保卫居住地域的都市国家的出现不能不说是以地域社会具备深刻的流动性为背景的。因此,不应该超过大洋东西而轻易设想中国古代也存在促使居民集住(synoikismos),并以广场(gaora市场)为中心团结起来以及建设城墙等特异的环境。后面我会谈到,依据岳麓书院藏秦简记载的秦代律文能够确认聚落的散村化,只着眼于世界史发展的普遍性未免太过固执了。

郑:这本书由已发表的文

(下转8版) ➡